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

我国的哲学思想发端甚早，但具有独立学派和较完备思想体系的哲学派别的出现，则在先秦“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广义来说也始于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当时每个学派在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都要对已经出现的思想资料，加以研究，作出评价，确定取舍。《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等篇，可以说是当时不同学派对哲学思想发展所作的不同总结。作为学术思想史的专门著作，最早出现的，应推明清之际黄宗羲著的《明儒学案》以及黄宗羲、黄百家和全祖望合著的《宋元学案》。“五四”运动以后，不少学者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作过种种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和教训。解放以来，在清除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方面，在对于中国哲学史上重大问题和重点人物的研究和探讨方面，在发掘和整理史料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写成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但是，由于我国哲学史内容极为丰富，

资料极为浩繁，整理和研究都需要时间。加以近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所以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对于哲学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都还处于探讨的过程之中，许多方面尚未深入研究，不少问题还有不同看法。可以说，今天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尚在“百家争鸣”之中。

列宁指出，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99页）不言而喻，中国哲学史即是中华民族认识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就要总结我们这个民族在认识过程中的许多经验教训，找出我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哲学思想的发展，离不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同样，中国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

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受我国生产和科学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所推动和制约的，是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殷、周奴隶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严格地说，哲学还没有从宗教和政治学说等意识形态中分离开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唯心主义，宣传“上帝”、“天”的命令和意志决定一切。殷、周的奴隶主阶级就用这种宗教唯心主义作为统治奴隶和平民的思想工具。与宗教唯心主义相对立，当时出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思想。相传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④，曾把“阴”、“阳”两种对立物质力量，当作一切事物产生、发展的动力。相传始作于周初的《洪范》，则把水、火、木、金、

土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元素，称之为“五行”。这些原始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同宗教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但是作为《易经》、《洪范》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仍然是宗教唯心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只是在宗教神学的体系下开始出现的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朴素观念。社会的大变动，必然促使哲学思想的大发展。从春秋，经战国，到秦王朝的建立，这一历史时期内，我国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和从封建诸侯国的割据争雄走上封建大一统的过程，整个社会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这种激烈的变动，打破了思想界死气沉沉的局面。先前主宰一切的“上帝”、“天”不灵了，原有的教条解释不了众多复杂的新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探索；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也要在这激烈的变动中，为本阶级的生存找出理论依据。这样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了我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潮。我国哲学思想各个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这时大部分已经提出来了，并开展了争论，得到了阐发。和殷周时期不同，这一时期哲学已从宗教等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不但唯物主义已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就是唯心主义也与宗教不同，是通过说理和思辨来论证它的观点的。这一时期，学术文化从官府的垄断走向了民间，形成了各种独立的学派。先秦的第一个学派，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应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是从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开始的。从秦汉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里，其中除了几个短时期处在分裂和混乱之中外，大部分时间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在封建社会里，多次出现了世界历史上仅见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居于世界

的先烈。这些情况对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都给予了深刻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使我国形成了完备的“中世纪”即封建主义时期的哲学形态。我国封建主义时期的哲学，不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作为它们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各种派别，以及它们歪曲认识的种种诡辩，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封建社会的保守落后、墨守成规，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也严重阻碍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封建主义的狭隘眼界，阻碍人们突破封建社会的框子去进行新的探索 and 追求。直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较迅速的发展，我国思想界才出现了新的因素。到了明末清初，方有在不同程度上批判封建主义，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潮的兴起。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这些大师们出来了。他们一方面在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对中世纪哲学作了总结，一方面开始了对封建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以及对发展资本主义朦胧的追求。但是，随着清代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巩固，这种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思潮又沉寂了。许多思想家被迫转入训诂考据的领域中去。这一状况，延续到西方帝国主义军舰和大炮打开了老大帝国的大门，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才开始改变。在“救亡图存”的声中，思想界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在船坚器利之外，看到西方还有个“西学”，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哲学及社会学说，认为要救国就要学西方。开始出现的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由于他们同封建主义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西学”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哲学思想，只是一个杂乱的拼盘，没有什么创见。继之而起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作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的孙中山，接受了西方

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继承了我国唯物主义的传统，创造了以机械唯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我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形态。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之前的最后一个进步的哲学形态。但是，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一致，他们在思想战线上也是极为软弱的，在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联合进攻下，很快就败下阵来。孙中山本人则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政治上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但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未来得及重新认识和改造，就逝世了。孙中山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再也提不出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至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丧失了任何创造能力，只是为了反对革命的需要，拾撮中外古今中一些反动哲学的碎片，拼凑种种反动哲学“理论”。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国，并迅速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国的哲学发展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我国之前的中国哲学史，到孙中山的哲学也就终结了。

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同哲学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一样，也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离开了这一点，就找不到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如果仅仅是简单地给我国哲学史上的学派和人物去“定性”，不去探求这些学派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特点，那末，即使“定性”全部“定”对了，也不能揭示出我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也不能使我们从中吸取有益思维的经验教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含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之间既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又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正如在生活中不能把对立统一歪曲为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的“斗争哲学”一样，在中国哲学史上（整个哲学史也

一样)，决不能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曲解为相互不受制约的绝对排斥的关系。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孤立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反之亦然。在我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乃是在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心主义者往往是把原有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尚未能正确地科学地说明的问题，作为自己的起点，然后夸大或歪曲认识的某些片段，建立起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同样，唯物主义者只有接受唯心主义者的思维教训，批判其对认识某些片段的夸大、歪曲时，才能战胜唯心主义，促使唯物主义的发展。在我国哲学史上，一些唯心主义者，也有少数唯物主义者，不讲道理，依靠某种权势，强行压倒对方，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种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一般地说，唯物主义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唯心主义则是没落阶级的世界观。但是，这只是在极为相对的意义说的。因为：第一，一个阶级需要那一种哲学，还要依据当时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而定。如在汉代，当时的地主阶级还不失为上升的、先进的阶级，但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基本矛盾已经相当激化了。所以，汉代自汉武帝开始，宁肯选定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作为官方御用哲学，而排斥桓谭、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第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哲学作为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它的独立性就更为大一些。当我们说某种哲学思潮是代表那个阶级利益的，乃是今天给它的科学评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多数场合下，只是这些哲学家客观的阶级本能驱使他这样想、这样作，并在客观社会效果确实起了为这一阶级利益辩护的作用，而不是说这一哲学家在创立某

种思想体系时，主观意图上明确地意识到，他的每个命题都是直接为那个阶级服务的。如果是这样，任何哲学思想体系都建立不起来。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往往出现许多复杂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列宁有句名言：“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5页）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阐述，也是有党性的。“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指导下，按照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目，详尽占有资料，通过“百家争鸣”的方法，找出其中固有的规律，总结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用以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则是力图按照其本阶级的需要，伪造和歪曲中国哲学史。在“五四”时期，胡适在把实用主义贩来中国的同时，打起“整理国故”的旗号，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中，对中国哲学史极尽歪曲之能事，甚至把生活在先秦的墨子，也说成是实用主义者，把中国哲学史变成为推行帝国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的商标和广告。还有个自诩为中国哲学史专家的人，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后，看到胡适的实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判下，已无力招架，便提出要“融合中西”，把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结合起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把西方的新实在论和程朱理学杂凑在一起，抛出了《新理学》、《新原道》、《新事论》等书，续封建主义的“道统”，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提供理论根据。解放以后，他又以“抽象继承法”为名，变相宣传“新理学”。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此人象过去拜倒在蒋介石的膝下一样，拜倒在江青的裙下，成为“四人帮”的御用顾问。此外，从“五四”以来，张东荪、张君勱、陈伯

达、康生等一些丑类，都先后利用、歪曲中国哲学史，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里，斗争历来是很尖锐的。特别是在1974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入猖狂的阶段时，中国哲学史领域内的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提出的什么“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等反革命口号，是采用卑劣的影射手法，直接攻击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用封建法西斯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他们的反革命口号带上一点“理论”色彩，便雇用一些无耻文痞，组成“梁效”、“罗思鼎”一类“写作班子”，加上前面说到的那个“顾问”和广东的某教授等，着手全面歪曲中国哲学史，把全部哲学史都纳入“儒法斗争”的框子中去。把法家说成是绝对的好，是前进、革新的动力；把儒家说成是绝对的坏，是复辟、倒退的根源。这些说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事实上也是虚构的。首先，儒家法家的称号，是沿用了传统的习惯说法。这种传统的称号，只表明某种师承传授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某些概念、命题的承袭关系。在同属一“家”之内，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所代表的阶级也会发生变化，内部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因此，用不同的“家”来划分先进和落后、唯物和唯心，是根本不科学的。其次，儒法斗争只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一度存在的历史现象。但那时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并不只有儒、法两家，即使按西汉的司马谈的说法，也有“六家”。最早相互对立的是儒、墨两家，并称为“显学”，后来道家、名家等影响也很大。可见，把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战线的斗争，归结为儒法斗争，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误概括。至于把秦汉直到现代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都说成是儒法斗争，那完全是为了其反

革命需要而制造的胡说。事实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儒、法早已合流了。封建统治者既需要利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又需要儒家“德政”、“教化”来欺弄群众。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代“以法为教”，只讲镇压而很快激起农民起义使政权覆亡的教训，采取了“文武并用”、“儒表法里”的两手政策。汉武帝时提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他搞的实际上就是“儒表法里”那一套。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经不存在了。“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发现”的许多“大法家”，归结起来无非两类。一类是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是他们用来装潢门面的。如王充、柳宗元、王安石、王夫之等等。这些思想家往往都以儒家自命，如果知道有人把他们“封”为法家，定会嗤之以鼻。就是那位写过《问孔》的王充，在他身上也找不出法家的痕迹。其实王充所反对的只是把孔子神化，并不主张把孔子一棍子打死，他还在《论衡》中多处称孔子为“圣人”哩！另一类是历史上的阴谋家、酷吏、特务，如吕后、张汤、来俊臣之流。不难理解，“四人帮”把他们封为法家，引为同类，乃是通过美化历史上的丑行来为他们现实中进行的反革命丑行作辩护。最后，“四人帮”一伙，把法家说成绝对的好，把儒家说成绝对的坏，也是一派胡言。对儒家和法家都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就法家而论，在先秦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斗争中，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法家作为独立的学派消失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曾被那时的进步思想家所吸取，溶合到我国整个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中去了，并没有再分彼此，另立门户。此外，法家所提供的一套专制主义的统治术，即所谓“申韩之术”，却为封建统治者当作护身符而继承下来。这一套东西，随着封建社会愈趋没落，愈成为消极的、反动的东西。这一套东西，实在

太丑恶了，历来反动统治者虽然暗中都学习它、运用它，却不敢公开宣扬。“四人帮”要“扬法”就是要将这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术，公开加以美化、合法化，从而搬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事实上也确实已搬出来了。可见，哲学史领域的斗争，和现实阶级斗争的关系是多么紧密相关啊！至于“四人帮”把儒法斗争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是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不须在此多说了。

第二节 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过程 中的几个特点

任何民族的哲学思想，除共性之外，都有它的个性。而共性是存在于个性之中的，不研究各民族哲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规律和特点，就无法使整个人类的认识史丰富和完备起来。各民族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受这一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所决定的。但并不排斥这一民族哲学史上某些突出的学派对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的深刻影响。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概括。这里，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及以后，孔子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孔子甚至被捧到“大成圣”、“万世师表”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这种现象，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是不能回避的。首先，应看到孔子的思想确实存在着对后世思想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面。因为孔子是个从奴隶主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个处于新旧交替过程中的人物。所以在他身上 先进的东西和保守的东西、唯物主义

但旧的残余和唯心主义也不少。这样使以后不同学派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根据。同时孔子是个开创者，他提出了许多命题，但是没有论证，这也给以后的思想家留下了大量发挥的余地。相传他还整理了“六经”，人们在利用这些思想资料时，往往也算在孔子的账上。这些应认为是孔子思想对后世影响的条件。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思想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在地主阶级还有所作为时，需要他注重人事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孔子及其后学者所提倡的“德政”、“教化”，他们所强调的以忠孝为本的等级制和封建道德，以及他们在鬼神问题上“神道设教”的应世主义。等等，都是封建统治者始终需要的东西。因此，不但在战国时，各执孔子一端而发展成的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具有很大的影响。秦汉以后，思想界先进和保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除了少数例外，许多场合都是在维护孔子学说的名义下进行的。双方都以孔子的话或“经书”作根据，指责对方“离经叛道”。其次，还应看到，孔子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还有虚假的一面。和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相适应，在思想战线上，地主阶级需要塑造出一个“绝对权威”，来推行其蒙昧主义和独断主义。由于上面讲的孔子自身存在的那些条件，从汉武帝开始，便把孔子作为偶像捧了出来。从此，孔子既交了“好运”，又交了“厄运”。“好运”也者，乃是生前经常处于“待贾”未售状况中的孔子，从此大阔特阔起来，甚至升入云端，成为“素王”。但同时“厄运”也就来了。对他的思想言行，作了有利于当时统治者的歪曲，把许多与他不相干的东西，甚至他反对的东西，统统加到了他的头上。孔子曾明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汉代的董仲舒一派，却硬是判定孔子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生而知之”者。要他充当

传达“天命”的伟大的预言家，把他描绘成一个异乎常人的怪物，使孔子神化，借以宣扬粗鄙的露骨的神学唯心主义。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唯物主义的批判下，这种粗鄙的神学唯心主义破产了。加上玄学和佛学唯心主义的冲击，行将没落的宋、明封建统治者，通过他们御用的学者，把孔子的偶像涂上了新的白粉。这时的孔子，便成为专讲“天理性命”的“道学先生”了。尽管孔子的门生都认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是，一千五、六百年之后的理学唯心主义者，却可以从什么“心传”的“道统”中“体贴”出这些东西来。直到清末的康有为，还要把孔子捧为“通天教主”，“改造”成主张君主立宪的祖师爷。综上所述，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分别孔子的学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影响和虚假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破除对孔子的迷信，在我国思想史上起着巨大的解放作用。当时批判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这也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孔子学说及其影响，作科学的、辩证的研究和评价，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至于“四人帮”一伙，把我国历史上所有腐朽的、反动的统治归之于孔子名下，还为孔子伪造一些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把孔子鬼化，那早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是一种别有用心反革命鬼蜮伎俩。

第二，和孔子的“仁”学相关，我国的唯物主义存在着一个侧重人事，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传统。“仁”学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把它扩大而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侧重点仍在人这一面，是以人为中心来研究利用以至改造自然的。可以说，从荀子到王夫之，他们的侧重点都是这样的。荀子肯

定了自然界存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但他反对放下人事不顾去思考、研究自然（反对“错人而思天”），而是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同上）使得“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荀子·王制》）王夫之认为，“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周易外传》）从而主张“以人道率天道”，达到“官天府地，裁成万物”的目的。（均见《思问录内篇》）这种传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对过去西方哲学中所谓的“自然哲学”有所偏废。我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中，虽然也看到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专门研究自然界发展规律及其特性的，在先秦的后期墨家之后，几乎是绝无仅有。这首先应归罪于封建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缓慢，但上面所说的传统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但是，从孔子的重人事，到荀子的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主张发挥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侧重于利用、改造自然的思想，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从这一思想出发，首先，导致对“行”的重视。我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所讲的“行”，是指个人的行动，与现代所说的实践概念有区别。但无论如何，他们重视“行”，从而研究、阐发了知与行的关系，并从荀子、韩非开始，我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几乎都坚持了“知”来源于“行”的唯物主义观点。韩非的“参验”说，通过许多实例来论述了只有通过实际的功效才能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理论，并指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把不经实际的检验就肯定而当作根据的理论，称之为“愚诬之学”。以后，王充、陈亮、叶适、王夫之等，都抵制了离开“效验”、“实效”来讲认识正确与否的唯心主义观点，坚持和发挥了韩非的理论，

形成了我国唯物主义的一个优良传统。其次，重视“行”的结果，必然注意知识的实在性。我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都很重视“实知”，主张实事求是。王充公开打出“疾虚妄”的旗帜，“崇实”构成了他的认识论的主要特征。在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了“崇实”的传统，揭露了道学家们“空谈性命”的虚妄，提出了“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叶适集·题姚令威西溪集》）以“道在事中”来反对道在物先的唯心主义。清代的颜元甚至说，“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存学篇》）再次，和注重实效相联系，我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都非常注意国计民生。他们受着阶级的局限，在中世纪都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维护封建制度这个框框。但是，他们和唯心主义者不同，着重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的现实状况，也注重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待实际存在的矛盾，提出自己的政见。有些唯物主义者了解到农民的疾苦之后，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他们从维护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和防止农民起义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反对兼并土地、减轻赋税等主张。我国哲学史上有不少唯物主义思想家，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家。历史上许多政治改革运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几乎都有唯物主义者站在斗争的前列。我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这种注重实际，强调经世致用的传统，应该认为是极为宝贵的优良传统。对此，必须认真加以总结，用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宝库。

第三，我国哲学史上，子思和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向侧重于人的内心修养方面发展，进而把道德力量夸大为决定一切的东西，提出了“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把道德规范的“诚”当作“天道”的内

容，并通过“诚”来沟通“天”、“人”关系。这样便形成了以统治阶级的道德力量作为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姑且称之为“道德型”的唯心主义，是我国思想史上特有的现象，并成为我国唯心主义的主要流派。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宋明的理学和心学，都属于这一类。这种“道德型”的唯心主义，有以下几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这种“道德型”的唯心主义那里，知识是从属于道德的，“智”是属于仁、义、礼、智这“四德”之一，并且是“四德”之末。按孟子的解释：“智之实，知斯二者（二者指仁、义）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就是说，“智”是为了了解和实践仁、义。后来的道德唯心主义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把知识当作罪恶。可见，这种唯心主义是以道德的独断作为特征的。在先秦，道家和名家的唯心主义，尽管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依靠思辨得出来的，在局部问题上有真理的因素，在歪曲认识过程中有思维的教训，不论从正面或反面都对人们认识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后来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也起过类似的作用。但在我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型”的唯心主义，则是扼杀知识的蒙昧主义。其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唯心主义哲学、道德、政治是“三位一体”的，构成了难以分割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三位一体”，始作俑者是孔子，形成体系者是孟子，集大成者则是二程、朱熹一伙理学家。在孔子那里，政治学说和论理学说是结合在一起的。“仁”既是政治概念，也是道德观念。《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同时并把“孝”和“忠”联在一起，认为“孝”是“忠”的前提，以封建道德来维护封建家长制和等级制。至孟子，一方面把“四德”归结为“五伦”，另一面又把“四德”上升为“天道”，完成了这个体系。到了董仲舒，

则突出了“天”和“君”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程朱理学，运用他们从佛学那里偷运来的思想资料，把“天理”、“人伦”、“君道”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更加理论化、绝对化。宣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把封建专制主义、封建道德都说成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这种“三位一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愈到后期就愈益成为腐朽的、反动的因素，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桎梏。而这种封建意识形态中，作为理论基础的就是“道德型”的唯心主义。再次，作为封建道德，它一则要维护那种静止的、很少发展变化的封建生产方式不受破坏；二则要叫人承认地主阶级攫取农民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是“合理”的，而劳动人民保障生存的权利和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是“不合理”的；三则要保障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族和等级制得以延续。因此，它总是以禁欲主义为特征的。并以反对“利”、“欲”，把“利”、“欲”说成是罪恶的根源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我国封建道德又是同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义”“利”之争、“理”“欲”之辩，也成为两种世界观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宋明理学的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教条，曾经成为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综上所述，对于这种长期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型”的唯心主义，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应该引起重视，捉住其特点，分析其原因，肃清其流毒。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

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页）

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个任务，无疑是十分繁重的，然而却是异常必要的。我们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学习中国哲学遗产对立起来，认为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够了，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幼稚得很，不值一顾。其实，这本身倒是一种幼稚病。在我国哲学史上，“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学习我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总结我国认识史上的思维教训，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全面深入地正确了解中国这个客观实际，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意义极大。“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这不但表明历史上的珍贵品必须继承，而且表明历史上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必须继续批判和清除。我国有过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影响至今还严重存在着。蒙昧主义、禁欲主义、专制主义经常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打着革命的旗号和打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旗号表现出来。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思想领域，主要是用包着马列外衣的封建思想来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行篡党夺权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因此，批判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批判从孟子、董仲舒到二程、朱熹那个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流派，清除至今还严重存在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流毒，扫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障碍，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